

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与社会公平的关系研究

赵国友

(四川农业大学 政法学院,四川 雅安 625014)

摘要:国际经验表明,在工业化初期,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越快,越易引发尖锐的社会问题。近年来,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对社会稳定和经济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于是,政府提出了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方针。有关人力资本积累的研究,总是与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相关联。事实上,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公平三者之间是一个关联整体,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对社会公平产生的影响正是通过教育投资收益规律进而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这一机制来实现的。

关键词: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教育公平;社会公平;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04-0122-06

一、引言

人类社会是在追求公平中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尽管历经坎坷和曲折。可以说,人类社会经历一个由原始社会的低级公平^[1]发展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极端不公平的过程。正是封建等级森严的极端不公平束缚和遏制了封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才触发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及最终胜利。但令人遗憾的是,掌权的资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没有将其主张“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付诸于具体的经济政治实践中,虽然执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鼓励自由发展,张扬个性,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之上的有钱人的公平把戏而已。所以,在发展了300多年的资本主义世界里贫民窟和失业者随处可见,仍然没有摆脱“贫富差距”的社会发展怪圈。

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和社会进步也是在追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民当家做主”等理想和主张中发生发展起来的。中国革命的目标是推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平等旧社会,实现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公平合理的新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

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历史经验表明,计划经济时代追求的是一种平均——“虚拟的平等”,而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以来,随着城乡差距的不断拉大,似乎“虚拟的平等”正在远离一些人们而去,社会不公愈加严重。随着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科学执政”理念的确立和实施,制度不公平、歧视农村的政策正在逐步扭转,但我们有理由担心:整个社会在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实施公平之后,农村发展、农民收入仍然赶不上城市发展和城市居民收入,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公平的起点不公平:农村教育十分落后,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太低。要构建和谐社会、降低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基尼系数的警戒线在0.5以下^[2],政府必须明确“三农”问题中的一项基础性、根本性的工作——那就是加快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扩大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存量——即加快农村的科学教育文化发展,才能根本改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城乡二元结构的现象和事实。

尽管社会公平研究视角非常宽阔,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等都有涉猎且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但教育公平置于社会公平的起点、将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纳入社会公平的研究视角算是另辟蹊径。

* 收稿日期:2009-12-20

作者简介:赵国友(1964-),男,河南固始人,经济学博士,四川农业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等。

基金项目:四川农业大学“211”三期建设项目“四川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发展”,项目负责人:赵国友。

二、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相关数据

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受历史原因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教育科技水平相对十分落后,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与城市居民相比差距较大。限于本文研究目标,对建国以来农村在科学教育文化发展及人力资本积累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暂不赘述,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城乡人力资本积累的比较发现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现状。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在我国现有人口中,具有大学程度(指大专及以上)、高中程度(含中专)的人口分别为6764万人和15083万人;另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资料,城镇高中、中专、大专、本科和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4倍、6.1倍、

13.3倍、43.8倍和68.1倍。如果据此将高中及其以上劳动力计算作人力资本的话,那么由上述有关数据以及表1和表2^[3]可得,全国人力资本总存量约为21847万人,城市人力资本总存量约为农村人力资本总存量的134.7倍,农村人口中的人力资本存量在162.19万人左右,占农村人口的0.2%;而城镇为21681万,占城镇人口的38.57%。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还显示,城镇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97人,农村为3.27人。以2008年为例,按家庭户数计算,农村每户仅有0.6个人力资本存量,而城镇每户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为1.3个。这种农村人力资本存量的绝对数和相对数与城镇人力资本存量相比相差太大,农户单个家庭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远低于城市单个家庭。

表1 全国城乡家庭户数及规模基本情况

年份	乡村总人口 (万人)	乡村户数(万户) 及规模(人) ¹	城镇总人口 (万人)	城镇户数(户) 及规模(人) ²
2003	76 851	24 793.1/4.1	52 376	43 840/3.0
2004	75 705	-/4.08	54 283	50 430/2.98
2005 ¹	74 471	-/3.27	56 157	-/-
2006 ¹	73 742	25 223/4.05	57 706	-/2.96
2007	72 750	-/4.03	59 379	-/-
2008	72 135	-/4.01	60 667	-/2.91

注:1. 2003—2008年数据为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推算数,“-”表示数据缺失。2. “1”与“2”表示乡村和城镇户数及规模(人),分别为调研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8)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8)。

表2 农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状况

平均每百个劳动力	单位	2000	2002	2003	2005	2006	2007	2008
高中程度人数	人	9.31	9.81	9.68	10.25	10.52	10.96	11.01
中专程度人数	人	1.83	2.09	2.11	2.37	2.40	2.48	2.54
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	人	0.48	0.56	0.64	1.06	1.25	1.29	1.45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统计年鉴》(2000—2008)、《新中国五十年农业统计资料》、《中国农业统计资料》(2008)。

由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涉及教育培训、健康保健、迁移等,覆盖面较宽,且统计口径不一,本文采取了便捷的方式,即将城乡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支出与医疗保健支出之和分别作为城乡人力资本投资成本(舍去了其他若干项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将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作为城乡居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舍去了其他若干项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根据城乡人均人力资本投资与收益曲线对照图(如图1),我们发现由于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起点低、家庭人均收入增长幅度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与城市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之间的差距呈显著扩大趋势。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支出与医疗保健支出之和在1990年仅有50.4元,而城市为137.93元,城市高出农村近两

倍,而十年之后的2007年城市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支出与医疗保健支出之和达到2028.25元,与1990年相比增长了近15倍,而农村居民2007年的人均文教娱乐支出与医疗保健支出之和仅为8541.66元,与1990年相比只增长了10倍。在全国实行教育、医疗同一收费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由于收入起点低不仅拉大了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而且在人力资本投资的差距也形成了数字鸿沟。1990年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为686.2元,城市为1510.2元,两者之比不到3倍,但2007年两者分别为15781元和4761元,已经超过3.3倍。图中4条曲线所显示的城乡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差异十分显著:城乡居民人均人力资本投资曲线都呈水平状,逐年增加,只是城市居民人力资本投

资增长幅度较大而已,但城市居民人均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曲线却呈垂直爬壁状,远远高于农村。根据上述有关城乡户数及规模人口数,每一人力资本负

担的人口数,再加上城乡人力资本投资与收益,我们最终得出结论:城乡收入差距不仅存在,而且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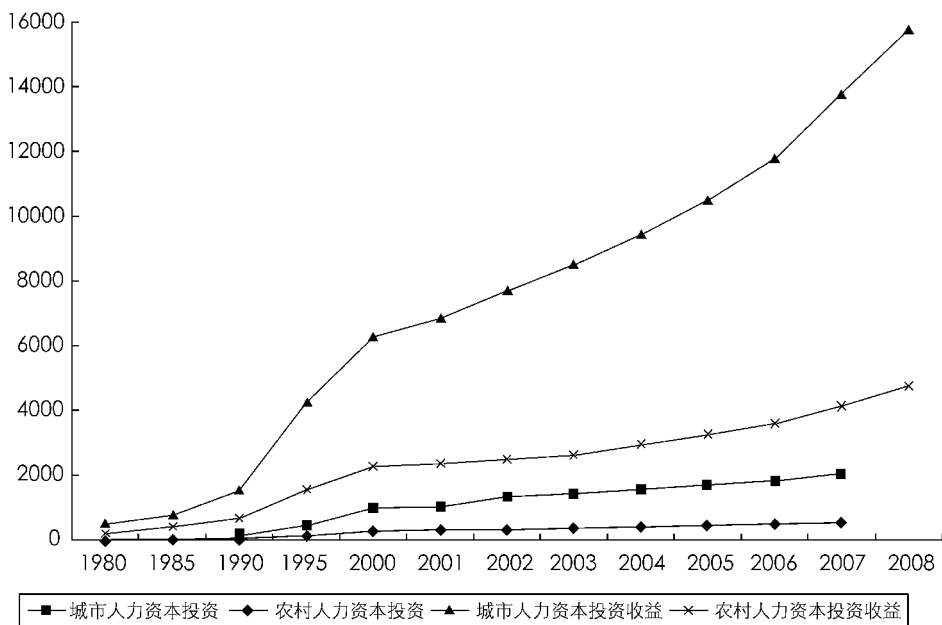


图1 主要年度城乡人均人力资本投资与收益曲线对照图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1—2008)和《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8)。

三、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对社会公平影响机制

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废止和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实施,政府在制度安排和政策支持方面会更加有利于农村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但自中央实施惠及“三农”的一号文件出台以来,农村发展、农民收入增加的事实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事实并存。考察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涉及考察社会公平的角度和标准,从过程和结果来衡量社会是否公平是必要的,但这是远远不够的。解决上述悖论的关键在于弄清社会公平的起点是什么以及这一起点的作用。本文以为社会公平的起点主要为教育公平,通过对教育投资,可以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一般而言,家庭和个人所接受的教育具有复制功能,如果对教育的投资愈大,人力资本的存量愈大,教育收益也愈高,这时教育对家庭、个人及后代充分显示了正面复制作用,反之则是教育复制的负面影响。正是城乡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差距太大,影响和延缓了农村居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的收敛过程,教育复制作用的负面影响充分显现。

(一) 社会公平及其起点

考察社会公平,一般有三个层次:起点公平(也称为机会均等)、过程公平以及结果公平。在今天

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我们谈及公平问题,最容易迁怒于竞争结果。实际上,一个社会是否公平,关键是看起点是否公平。当然,过程公平也是必不可少的。竞争结果的公平往往是指收入、财产及福利的分配是否合理公正,而社会制度及政策则关系到竞争过程是否公平合理。现在,我们不妨假定竞争过程的规则及制度是一视同仁的,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公平合理的,不存在制度歧视和政策偏向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要考察竞争结果是否公平合理,仅仅认为有差距就不合理可能是一个偏见。如果过程及结果都是公平合理的,仍然存在差距问题,那么造成差距的原因只有竞争起点不同了。逻辑推理中的直言三段论推论过程显示,如果推理中的大前提错了,不论小前提和推理结论肯定都是错误的,大前提为正确的同时,要求小前提也必须是正确的,否则,推论的结果也会出现差错^[4]。很显然,社会公平的三个层次与直言三段论的推理极为相似,要保证社会公平结果的效用最大化,必须保证竞争起点这个大前提是公平的,也即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均等的社会经济机会,然后保证竞争过程和竞争结果小前提是公平的,社会所提供的制度和政策不是因人而异,收入分配结果公正合理,那么可以说社会公平的效用达到最大化。即便仍然存在一些差距,但导致这些差距的原因可能属于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例如,一些人因天生智力问题、后天的

生理疾病问题,等等。

在此,把教育公平作为社会公平的起点,也不是什么新的观点。许多学者对此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教育公平实质上是指教育机会均等,有学者将其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机会均等。各社会成员不分性别、种族、出身、经济地位等条件的差异,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第二个层次是过程公平。在教育过程中,每个接受教育的人,都能享有同等的教育资源,都能得到有利于自己发展的个性教育,并且因为这样的因材施教,使具有不同禀赋、家庭资源的学生缩小其能力上的差异。第三个层次是结果均等。学生在接受同等教育后能够获得相同的学业成就,个体全面发展,实现实质上的平等^[5]。可见,那些认为在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首先需要的是中等教育增加的观点^[6],只能导致“拉美陷阱”式的发展,是十分可怕的。因为这种精英教育观最终损害的不仅仅是教育公平,更为要紧的是更多的人将会失去他们当前最为需要的基础教育,从而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失去更多的经济社会机会,这一结果只能酿成差距扩大,加剧社会不公。

(二)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中,个人的收入不仅取决于他的个人天赋和继承的家庭遗产,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所受教育的程度。受教育较多的人通常具有较多的人力资本,这些人力资本可以使他们获得比较高的收入。当代主流经济学认为,教育原本的功能是帮助个人积累其“人力资本”,增加受教育者的知识和技能。在现代的市场经济中,个人之所以这样普遍地愿意接受更多的教育,不仅是为了增加自己可能有用的人力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向雇主们发送有关自己的能力与生产率的信号,以便摆脱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就业困境。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由于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以及市场化浪潮在猛烈地冲击着教育领域,在城乡教育形成了巨大差距。收入较高的个人和家庭可以自己或将其子女送到教育条件较好的学校就读,而这对于收入相对较低的个人和家庭来说只能是一个愿景。教育的这种所谓的“市场化”也加剧了市场经济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这种所谓的“市场化教育”的最大恶果,就是它在强化社会中的不平等机制,加剧人生起点上的不平等^[7]。

教育是使个人收入的社会分配趋于平等的主要因素和途径。通过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可以使经济增长,增加个人收入,从而使个人收入社会分

配的不平等现象趋于减少。因为通过教育可以提高人的知识和技能,提高生产的能力,从而增加个人收入,使个人工资和薪金结构发生变化。舒尔茨认为个人收入的增长和个人收入差别缩小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一些教育相对发达的国家经验也正是上述观点。教育对个人收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首先,工资的差别主要是由于所受教育的差别引起的,教育能够提高工人收入的能力,影响个人收入的社会分配,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衡状态。其次,教育水平的提高会使因受教育不同而产生的相对收入差别趋于减缓。舒尔茨认为随着义务教育普及年限的延长,随着中等和高等教育升学率的提高,社会个人收入不平衡状况将趋于减少。再次,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还可以使物力资本投资和财产收入趋于下降,使人们的收入趋于平等化。舒尔茨指出在国民经济收入中,依靠财产收入的比重已相对下降,依靠劳动收入的比重在相对增加,其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随之增加。

教育的功能不仅体现在上述功利价值上,还有一些更为基本和重要的功能。正如教育家杜威认为的那样,教育具有人的社会化,即社会整合的功能,因为“教育是生活的社会延续手段;具有社会平等化的功能,通过免费的公立教育能够改善处于不利地位人群的状态;具有促进人的身心发展、自我完善的功能”^[8]。在客观存在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巨大不平等的情况下,教育给人提供公平竞争、向上流动的机会,帮助弱势群体摆脱其出身所拥有的不利社会自然环境,显著改善人的生存状态,减少社会性的不公平。因而,教育尤其是现代教育,在教育作用显著增强的社会条件下,既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科技创新的“助推器”,同时,也被视为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和“平衡器”。美国“公立学校之父”的赫拉斯·曼如此宣称:“教育是实现人类平等的伟大工具,他的作用比任何其他人类的发明都伟大得多。”^[9]

在我国当前经济社会机制中,教育的复制功能充分显现。就像贫困具有代际传递效应一样,教育同样具有代际传递效应。上一代所受教育对下一代的教育水平具有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社会流动的动力机制。在我们能获得数据而加以分析的所有工业化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中,对‘谁走在最前面’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就是‘那些获得了教育的人’。”^[10]不仅如此,上一代因受良好教育而聚集的社会物质财富也为下

一代接受更高更好的教育提供条件。而一旦失去教育公平,其结果是机会均等丧失,也就是一些社会成员因客观上无法享受相应教育而导致“能力贫困”,丧失平等的社会经济机会,即使竞争过程各项规则是统一、公平合理的。如果失去教育公平,那么在社会成员中则会形成教育分化。这种分化的最大危害在于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他们越来越追逐名利和物质享受,对于美德、社会责任则置之脑后^[11]。更有甚者,“在发展中国家,事业的文化人会造成政治的不稳定因素,并且形成一种轻视体力劳动的价值观念”。^[12]

所以,教育机会均等就成为教育公平、教育民主化的核心问题。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主要是为了改变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阶层的教育状况,它“意味着人和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或文化方面的低下状况,都应尽可能从教育本身得到补偿”^[13]。一些研究结果证实,改革开放以来,导致教育机会不公平的一些列因素的作用不断增强,教育从一种促进社会个体之间社会经济均等化的手段转变成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分化的机制^[14]。农村居民在享受教育资源方面的有限性,使其丧失受教育的机会,从而在收入、社会话语权方面难以与城市居民相抗衡,并且形成了一种以“能力贫困”为核心标志的“相对贫困综合症”。

简而言之,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对社会公平影响机制就是农村居民因缺乏必要的教育资源、教育投资乏力等而无法形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具有各种知识和能力的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只能获得较低收入,并进而丧失社会、政治话语权,犯上“综合贫困症”。所以,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不仅影响农村居民的收入能力,而且对其权利能力生长与维护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教育不公平使得农村居民“被剥夺的不只是公平的物质分配,而且更被剥夺了作为社会成员应有的尊严。这是一种双重的社会非正义伤害”^[15]。

(三)教育不公平的表现

在我国,无论是从教育机会、教育资源、教育过程还是教育制度来看,教育不公平是一个常态。农村居民在教育上遭受的不公平首先表现为教育机会贫困。当前农村教育的基本情况很难令人乐观,农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不足7年,还处在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学生的流失、辍学相当严重。我国3/4以上的文盲、半文盲人口集中西部农村、少数民族和国家级贫困县。城乡教育之间的巨大差距,在存量上表现为人均受教育年限

的差距。2000年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62年,其中城市人口为9.80年,农村为6.85年,城乡差距为2.95年。在校生中表现为学历层次越高,农村人口的比例越少。以2000年为例,当年全国小学生升入初中的比率为94.9%,但农村的比率仅为80.8%,城市高出农村25.7个百分点。全国初中生入高中的比例51.2%,但农村的这一比例仅为7.1%,城市在这一比例上高出农村9.4个百分点。农村居民的教育机会贫困意味着教育机会的丧失,失去教育机会的结果,使得农村居民在就业方面只能处于被动,由工作来选择人,而不是相反;在教育资源配置上,城市明显优于农村。据200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在全国义务教育总投入中,乡镇负担78%,县财政负担9%,省市负担11%,而中央财政负担只有2%^[16];从教育过程上来看,教育体制和教育政策明显倾向于城市,不仅农村接受中小学生的教育的机会少于城市^[17],而且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更少,尽管绝对人数在增加。以高考招生为例,北京每千人获得的我国前20所著名高校的招生配额是河南配额的5.6倍,上海则是河南的8.3倍;从教育结果上看,具有一定开发价值的劳动力资源不仅因教育规模、教学设施等条件限制而失去进一步开发的可能,而且由于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结构,劳动力自由流动空间有限,即使接受同等教育,农村学生也难以与在城市社会资源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城市学生进行就业竞争。教育竞争的结果是有失公平的。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延缓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过程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竞争过程趋于公平化,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趋势丝毫没有减缓,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城乡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巨大差距。政府在注重政策调整的同时,要时刻关注农村居民的教育发展,将农村教育发展纳入政府中心工作,对农村教育经费加以法律化,通过法定程序将农村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例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不得以任何借口减少农村教育发展经费。

(二)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

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实质是农村居民各种能力的提高,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保证。在知识经济社会里,人力资本的作用和能量已经远远超出物质资本的作用和能量。提高农民收入,缩

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提高和增强农民增加收入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则是农民获得公平社会经济机会的原始起点,而获得这种能力和社会经济机会的手段则主要是教育。政府在农民无力改变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时要承担起整合社会的责任,在多少予少取放活、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的情况下,通过加大教育体制等改革的力度来提高农村居民的科学教育水平,以便形成农民可以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择业能力。

(三)教育不公平放大了社会不公的效应

有人借用社会排斥与社会公正的概念分析工具来分析社会现实中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之间的关系。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分层十分明显,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的分割壁垒为整个社会融合设置了许多障碍。就农村居民而言,由于人力资本投资少、积累质量低,导致教育机会的丧失和能力贫困的生成。与此相关联,农村居民在职业选择、权益保护、社会福利等方面受到极为不公正的待遇,受到各种社会排斥。阿特金森曾指出,从事不稳定的或缺少职业培训和保护的边缘工作(marginal job),往往不能保证将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们融入社会^[18]。这一研究结论恰好印证了中国的一些事实,如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遭到各种社会排斥而难以融入主流社会。农村居民由于受教育程度而成为劳动力市场中另类“人力资本”,成为“被排斥的消费者”;由于“能力不健全”而“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由于“三等公民”而被排斥社会保障之外。还农民真正的“国民待遇”,是改变农民遭受上述一系列社会不公的最基本前提,也是政府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最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1] 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M]. 李常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3-36.

- [2] 李强. 从社会学角度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J]. 社会科学战线,2005(6):241-250.
- [3] 赵国友. 实现经济增长中的社会公平的路径依赖——基于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视角[J]. 探索,2006(6):30-34.
- [4]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逻辑学教研室编. 逻辑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114-131.
- [5] 程晓樵. 教育机会均等概念的跨文化分析[J]. 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04(6):58-64.
- [6] (瑞典)冈纳缪尔达尔. 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M]. 顾朝阳,等译.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157.
- [7] 左大培. 市场化的教育加剧起点上的不平等[BE/OL]. <http://finance.sina.com.cn>,2006-08-17.
- [8] 鲍尔斯,H金蒂斯. 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M]. 王佩雄,译.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28.
- [9] J·S. 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66.
- [10] Deng, Zhong and Donald J. Treiman, The Impact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rend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hina[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7, Vol. 103:391.
- [11] 林荣日. 教育经济学[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68-189.
- [12] (英)阿特金森. 教育经济学引论[M]. 林荣日,等译.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41-54.
- [13] (美)查尔斯·赫梅尔. 今日的教育是为了明日的世界[M]. 王静,等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69.
- [14] 李春玲. 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G]//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 中国社会分层.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94.
- [15] 徐贲.“蜜友资本主义”背景下的社会冲突:当今中国的贫困和暴力[BE/OL]. <http://www.revu2005.com>,2005-12-08.
- [16] 张守祥. 关于农村义务教育投入问题的思考[G]//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2005—2006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研究报告.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251-254.
- [17] 庞守兴. 困惑与超越——新中国农村教育忧思录[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75.
- [18] 黄洪,李剑明. 困局、排斥和出路:香港“边缘劳工”性质研究[R]. 香港施乐会,2001.

责任编辑 张颖超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 of the Countryside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ZHAO Guo-you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Yaan 625041,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ndicated that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initial period, the more quickly a national economy grows, the more easily it initiates the incisive social problems. In recent years, while our country's economy continued to grow, the income disparity between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side is unceasingly enlarged, and poses problems on social stability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o my Government has proposed a sound and fast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y. The research o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s always associated with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fact, the rural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urban-rural income disparities, social justice are correlated. The impact of the rural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on social justice and is exerted through rural-urban income gap caused by the education investment reward principle.

Key words: countryside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educational justice; social justice; income disparity